

#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Entry Poi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Hengjin Ca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oftwa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Email: hjcai@yahoo.com

Received: Dec. 20th, 2011; revised: Feb. 29th, 2012; accepted: Mar. 7th, 2012

**Abstract:**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7 has evolved into global game of sovereign currencies,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urrency RMB ha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China since Qin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last five centuries, a new concept of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is introduced and a new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s is proposed.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describe the demands originated from human cognitive tendency to confirm self value. Normally, people tend to give themselves higher than average evaluation within their scopes, and expect to receive more than they would be supplied, if possible. Therefore, the total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of a society tend to exceed the total current supplies. This gap is a challenge to any ruler or manager. To maintain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society, the excessive demand has to be met with extra supplies. We propose four types of extra resource suppl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llenge: learning and innovations, external acquisitions, overdraws from the future, and dynastic changes. It is the key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that their citizens'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are properly satisfied. China is now facing a chance of once-in-a-millennium, an intersection between Chinese two-millennium history and the five-century global modernization. Three resource emergences, learning, trade surplus and restarting from ruins, are taking place in China simultaneously. The abundant emerging resources ar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failure to properly utilize the resources will lead to formation of economic bubbles, and the consequent bust of the bubbles will result in heavy losses of public wealth which in turn exerts permanent harm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therefore,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people-oriented monetary system by creating and registering a society security personal account for every citizen and distributing the emerging resources to each account equally, and to make it the best entry poi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

**Keywords:**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 Resources Emergenc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Social Security Personal Account

## 中国崛起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

蔡恒进

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 武汉  
Email: hjcai@yahoo.com

收稿日期: 2011年12月20日; 修回日期: 2012年2月29日; 录用日期: 2012年3月7日

**摘要:** 2007年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已转化为主权货币的全球博弈, 而人民币升值是其中焦点。考察中国自秦以来和西方五百年来的发展历史, 我们提出自我肯定需求的新概念和一个在分配环节的全新的供需理论。只要有可能, 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 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我们称之为自我肯定需求。大多数情况下, 总的自我肯定需求

必定大于其所在社会的当下产出，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个缺口必须由额外的供给来填补。纵观历史，我们指出四种主要的额外供给方式：学习和自主创新、外部获取、透支未来以及崩溃后的再出发。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是否得到适度的满足，正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历史进程与全球五百年以来现代化进程的交汇点。学习和自主创新、外贸顺差以及再出发这三种财富的涌现方式同时在中国上演。大量涌现的资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但是不合理的运用会驱使中国经济泡沫化，泡沫化的后果就是金融危机和公有资产快速流失，国家的发展潜力受到实质性损害。因此，我们提出创建一种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为每一个公民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注资，将涌现的资源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以此作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佳切入点。

**关键词：**自我肯定需求；资源涌现；发展方式转变；社会保障个人账户

## 1. 引言

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是一个仅有百多万人口、十多万军队的民族，何以能横扫欧亚大陆，成为第一个全球化的帝国？匈奴同样是北方的骁勇民族，却为何溃败于汉武，被驱逐于千里之外？唐宋的科技与文化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顶尖水平，却未能比其他朝代维持更长时间？而位于亚欧交界的小国葡萄牙，又是凭借什么触发欧洲经济的腾飞？中国的朝代更替是否与近代财富中心的迁移有着本质区别？探寻国家兴亡的神秘规律是经久不衰的课题。

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sup>[1]</sup>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sup>[2]</sup>中引入复杂化投资回报率来评价社会的崩溃。曼瑟·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sup>[3]</sup>一书中从分利集团的多少及其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奥尔森指出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是国家衰落的一般原因，但不存在大量分利集团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我们考察了上述观点认为，诺思无法解释诸如改朝换代带来经济飞跃的现象；泰恩特没有解释“投资回报”低就会崩溃的本质；奥尔森阐述的分利集团也只是伴随现象。我们在分析了东西方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应从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出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寻国家兴衰规律。

## 2. 中国崛起在历史上的定位

中国的历史是在盛衰循环中不断前进的。关于国家兴衰的根源，历史上众说纷纭，某些学者认为造成

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或文化。事实上可以从国家财富转移的角度来看王朝的兴起和灭亡。

虽然国家不能选择自己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民族信仰、公民等等，但是国家的运作模式其实与公司的运作模式类似。作为公司来说，其财富或市场价值不仅包括现有的资产，还包括未来发展的预期收益。国家也是这样，财富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有形的财富如金银珠宝，土地，军队等等。无形的财富如法律、制度、文化、宗教、声望和控制力等等。它们都是持续发展和未来收益的保障。作为规范财富流动的框架，法律和制度等因素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形式，随时间流逝也不断改变，因此我们聚焦于财富的产生、流动和湮灭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梳理其它重要关系。

王朝建立初期，因为战乱贫困以及人口减少，财富分布比较平均，皇帝有强大的军队，声望，和控制力，这时皇帝掌握的潜在财富非常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需要代理人来代理，皇帝之下必定有某些权力或利益集团。他们有不断增长个人财富的需求，会用特权来谋取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在与皇帝及老百姓争利。他们不仅在侵蚀了皇帝的有形的财富，还会侵蚀皇帝的无形财富。利益阶层的影响和控制力在扩大，同时特权阶层的腐败、掠夺和不公使得民众对国家失去信心，结果就是皇帝的声望下降，权利被削弱。因此在皇朝的末期，皇帝可以支配的资源实际上很少，这时若有内乱或外扰做导火索，整个系统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从图 1 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持续的时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以来，历史比

较长的朝代只有汉、唐、宋、明、清。除了分为西汉和东汉的汉朝，和分为北宋和南宋的宋朝，自秦以来其它朝代都不超过 300 年。

近 700 年的世界史显示西方的财富中心是不断迁移的。图 2 是世界财富中心之间的时序关系。这种西半球范围内的财富中心转移，其本质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中国一开始就以天下为己任，囊括了可以有效统治的人口和土地，财富中心不是转移出去而是在华夏地区重新兴起。蒙古人打通了东西方的连接，向西方展示了东方的财富，西方终于可以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在东方财富的滋养下步入工业文明。公元 1500 年前后，从葡萄牙开始，西方诸国开始逐渐登上世界舞台，但是其各自的统治地位都没有持续 300 年。

### 3. 自我肯定需求是国家兴衰的内在根源

传统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定之上的。它假定人能够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其掌握的信息，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通过市场的作用、价格的调整，社会总需求可以与总供给达到均衡。但是，金融市场的动荡，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市场经常偏离均衡状态，甚至走向极端。卡勒曼和特维斯基的“参照依赖理论”认为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照点决定<sup>[4]</sup><sup>5]</sup>，也即通过比较来判断得失。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资源给人带来的效用是相对的<sup>[6]</sup>。即使获得的总量很小，但只要与他人相比较大时，我们就会得到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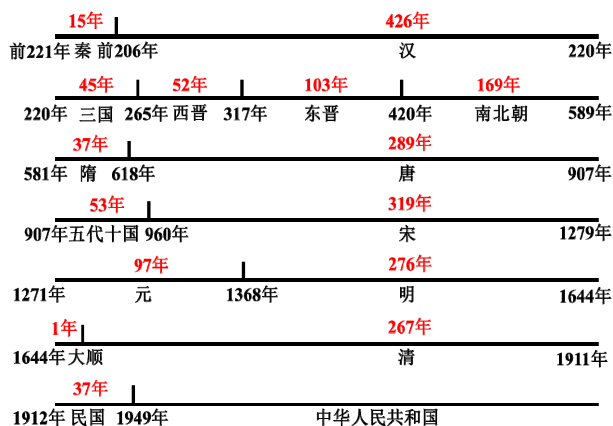


Figure 1. Re-definit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of China since Qin Dynasty  
图 1. 中国历史分解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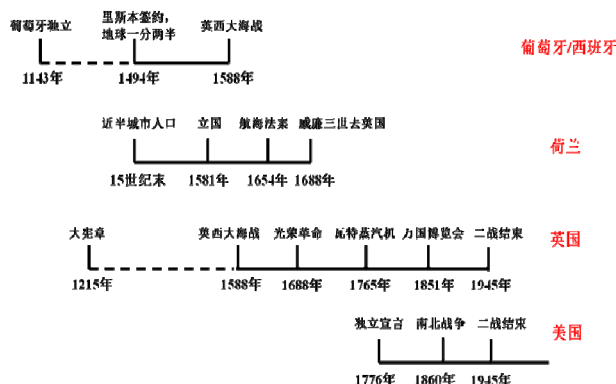


Figure 2. Time sequence of the migration of western wealth centers in the last 700 years  
图 2. 西方财富中心迁移时序图

相反，如果小于其他人所得，即使获得的总量很大，我们也会不满足。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sup>[7]</sup>，但我们认为人的需求来自于理性与自我肯定，是可以量化描述的。我们依据人的参照依赖心理特征，排除掉随机的和完全非理性的需求之后，将需求分为两类——理性经济需求和自我肯定需求。理性经济需求是每个人在其已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后产生的需求。与之相对的是自我肯定需求，它是人在理性经济需求之外的，建立在对自我的主观判断上的需求。我们认为，自我肯定需求源于比较，人所进行的比较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自己的现在与过去比，另一种是将自己与他人比。这两种比较加上人对自己的肯定而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理性经济需求的自我肯定需求。因为人是倾向于肯定自我的，在面对选择时，人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更倾向于认可自己，并期望获得高出平均水平或超出过去水平的报酬或认可。

将每个人的自我肯定需求加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因此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会大于这个社会当下产出的总供给。这样在可分配资源与人们总需求之间必然存在一个缺口。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是针对消费环节的，与本文提出的自我肯定需求过剩并无矛盾。

分配环节的供需缺口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统治者必须想办法寻找资源来填补这个缺口。纵观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发展，我们认为有四种主要资源供给方式(财富涌现方式)，来填补这个缺口，

如图 3 所示。

第一种方式是学习和自主创新，包括制度层面和科学技术层面。制度的创新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改变，技术创新则由新技术、新发现带来。制度创新使得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更先进的替代。而科技创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技术革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大的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已一个或多个技术领域为先导，波及生产生活的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社会成员的自我肯定需求得到满足。向外学习与自主创新相比更少耗费资源、更具爆发力，因此后来者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第二种方式是外部获取，包括与外部社会进行贸易、自然的领土扩张、古时游牧民族的抢掠，以及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当今世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大部分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成本远远高于获得的回报。只有过去的游牧民族，例如 13 世纪的蒙古，掠夺比他们发达的国家(例如宋朝)才更有意义。比他们发达的国家拥有他们期望得到的财富与物品，所以不管是通过贸易还是掠夺，落后国家能从发达国家获取新形式的财富或物品，这正是他们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总自我肯定需求的方式之一。在这几种外部获取的方式中，贸易是最长久也最实用的方法。重商主义国家强调要出口大于进口，使国家内部的和谐发展在外部财富的补充下得以实现。

第三种方式是透支未来，用未来的财富来弥补今天的缺口。通过印钞、借贷、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我们可以提前使用未来的资源。未来是无止境的，那么将未来的财富和资源预先支取，用以满足当下的需求，是完全可行的。而且这种方式能够

迅速提升使用者当下的竞争力，毕竟两个其他条件都相似的竞争者，如果其中一方透支了未来，那么他就拥有了更大的比较优势。这是一条极其简便而且短期效用巨大的方法，因此每当遇到较大的经济困难时，大部分的统治者都会选择这条金融创新的道路。原则上讲，未来是无止境的，因此透支可以非常大。但是这种透支行为的伸缩性也很强：当经济状况较活跃时，人们的情绪也比较乐观，这时对未来的信心较高，因此透支也会更多；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情绪，那么他们就会更关注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保障，因此透支也就会相应减少。这种对未来信心的波动使得金融市场缺乏稳定性并导致金融危机。

最后一种方式是崩溃后的再出发。以中国为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最长不超过四百余年，就会经历一次改朝换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百废待兴，规则和制度要重建，资源被重新分配和占有，资产重新在低水平上定价。最高统治者通过放权让利，让社会成员追逐资产，从而使资产价格逐渐上浮，少量的付出就能获得较大的回报，全社会总的自我肯定需求较易得到满足，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西方近五百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相同的机制，其崩溃的实质都在于旧的财富分布结构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炉灶才给人们新的希望。落后国家对发达的国家进行侵略与吞并也有着与改朝换代相同的性质。

按照财富流转的机制，中国自秦统一后的历史可以有一种完美的分解。历朝历代存在时间少则数十年，多则也不过三四百年。朝代初期，财富分布比较平均，社会各阶层的自我肯定需求容易得到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权力代理者有着不断增长财富的需求，根据中西方各国近百年 GDP 增长及财富与实物增长相对比例关系的数据，我们假定其需求按照 3.6% 的年增长率增长，在 300 年后财富将会增长 4 万多倍。而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提供这样的增长，其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各个朝代的更替都会经历学习与创新、外部获取、透支未来以及王朝崩溃的过程。自我肯定需求理论同样适用于西方财富中心的变迁。公元 1500 年前后，从葡萄牙开始，西方诸国以东方财富为滋养，交替走上世界舞台，但是其各自的统治地位也没有超过 300 年。此外，这一规律也可以解释当今的



Figure 3. Four types of wealth emergences  
图 3. 财富涌现的四种主要方式

金融危机。财富依然是向社会中居于上层的少数人或集团流动。当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全社会自我肯定需求得不到满足，因而产生崩溃现象。

#### 4. 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佳切入点

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是否得到适度的满足，正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强大国家的建立，大多是从相对落后的状态中快速发展起来的。秦人扫灭六国如此，满人入主中原亦然。蒙古铁骑之所以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们起点低而外部资源丰富。当时他们可以学习的对象是宋朝，而后者创造了空前发达的科技和文化。同样的理论可用来解释葡萄牙的崛起。当初它作为偏居欧洲一角的小国，起点同样很低，所以有着强烈的向外扩张渴望，而愿望的满足又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渴望。像唐、宋这样发达的王朝依然无法避免衰落的命运，因为其盛世的背后通常隐藏着不断扩大的自我肯定需求。当统治者的权利不断被侵蚀，却又没有找到额外的资源供给之时，王朝自然走向末路。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学习和自主创新、外贸顺差以及再出发这三种财富的涌现方式同时在中国上演。大量涌现的资源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地掌握其释放的进程，就会使我们错过这次发展良机。前文提到的第三种方式——透支未来，对于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越来越热衷于这种方式，因此如果我们不学会运用，则会在与他们的博弈中处于劣势。但是，不合理的使用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资本的逐利本性很可能利用前述三个有利因素而驱动中国经济泡沫化。而泡沫化的后果就是金融危机，公有资产快速流失，国家的发展潜力受到实质性损害。引进外资、发展房市股市等金融手段已经加剧了贫富的差距，影响了中央政策的执行。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变发展方式，那么西方国家就可以通过制造危机来提前抽取中国发展的潜力，使我们永远地失去这次机会。

因此，在这个转型的重要时期，我们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处理国民的自我肯定需求与经济的关系。财富有着向上流动的规律，大量的财富向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在财富金字塔底端的广大民众的财富则在加速流失。我们要明确认识到这一规律，并合理地利用它，运用最简单的方式，将财富向底层转移。

因此，我们建议为每个公民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平均发放人民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与每个人最基本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建立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来引导中国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涌现的资源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无疑是最公平的方式。这也可能是最有效的促进生产的方法。因为低收入消费者手里的钱最有可能进入生产-消费的循环，产生最大的乘数效应。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分发人民币，可以提高内需，大幅改善国内经济运行，使得广大公民切实体会到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缩减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在减少国内厂商对于国际市场依赖的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减缓外汇增速，甚至减少外汇储备<sup>[8]</sup>。这样可以满足全体公民的自我肯定需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建立以人为本货币制度的一种可能的实施方案是：利用人民币汇率有升值压力的契机，为每一个公民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注资<sup>[9,10]</sup>。人民币升值潜力是一项数量巨大的红利，以2004年底25.3万亿元广义货币计算，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到2011年升值了20%以上，这意味着我们曾经有5.5万亿元的红利，也就是相当于人均有四千元可以分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曾经是实施这个方案的良机，在经济放缓的时候对公民注资，拉动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中国为保GDP增速而快速投入4万亿让部分资本有了脱身并变成热钱的机会，但通货膨胀的后果却由全民承担。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不是实施这个新货币制度的最佳时机(虽然可以以通胀补贴的名义实施)。当务之急是征收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对买卖股票、贵金属、农产品和房地产等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征税。这样可减少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减少热钱带来的伤害，收回一部分流动性。在通货膨胀缓解之后，实施新的货币制度，逐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道格拉斯·诺思, 罗伯斯·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2] 约瑟夫·泰恩特. 复杂社会的崩溃[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0.
- [3] 曼瑟·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2009.
- [4] D. Kahneman,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47(2): 263-292.
- [5] A. Tversky, D. Kahneman.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1992, 5(4): 297-323.
- [6] R. Thaler (Ed.). *Advances in behavioral fin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3.
- [7] 马歇尔. 朱志泰, 陈良璧, 译. *经济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8] 蔡恒进. 构建新的货币制度是发展模式转变的根本之道[Z]. 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102.
- [9] 蔡恒进. 构建以人为本货币制度的探索[N]. *中国改革报*, 2009, 5.
- [10] 蔡恒进, 曹晓丽, 黄政. 为全民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人民币升值红利的再分配[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135: 91-95.